

“广义认知诗学”专题研究(3篇,主持人:熊沐清)

主持人语:文学的认知研究最早可见于20世纪50年代,而“认知诗学”的英文术语则为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鲁文·楚尔(Reuven Tsur)教授于20世纪80年代所创。21世纪初,因英国诺丁汉大学彼得·斯托克维尔(Peter Stockwell)等人的两本姊妹篇《认知诗学导论》(2002)和《认知诗学实践》(2003)而开始流行。另一方面,与之同时甚至更早的研究是认知修辞学、认知叙事学、认知文体学、认知文化研究和认知文学研究等。目前,上述研究已经被国外学界统称为“认知诗学”或者“认知文学研究”。在这样的境遇里,作为后起之秀的中国认知诗学学者群体正奋力前行。除了通过翻译和评介等方式来积极引介、消化和吸收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中国认知诗学学者还积极行动起来通过组织学会、会议、论坛并创办期刊等形式来推进本土化认知诗学的发展。2008年和2010年,我们就先后召开了首届全国认知诗学学术研讨会(南宁)和首届认知诗学高层论坛(北京)。2013年,“认知诗学分会”通过挂靠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界面研究专业委员会的方式开展活动。自2013年起,学会每逢奇数年举办国际性认知诗学学术研讨会;每逢偶数年举办全国性认知诗学高层论坛。迄今认知诗学分会已经举办了四届国际性认知诗学学术研讨会,分别是:2013年重庆(四川外国语大学承办)、2015年广州(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承办)、2017年北京(中国石油大学承办)、2020年哈尔滨(哈尔滨工业大学承办)。2014起,学会还创办了《认知诗学》学术辑刊,现已公开出版八辑,对认知诗学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2021年7月,分会被“中国比较文学学会”接纳为二级学会,同年11月“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认知诗学分会”正式成立,这标志着中国认知诗学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不过,随着认知科学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新观点、新方法、新探索和新概念正在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领域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无论外国学界还是中国学界,现有“认知诗学”或“认知文学研究”术语和概念已经无法容纳和涵盖这些层出不穷的新方法与新范式。为此,我们在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认知诗学研究理论与版图重构”(项目编号20&ZD291)的研究过程中旗帜鲜明地首次正式提出“广义认知诗学”概念。作为重大招标项目的前期系列成果之一,本专题三篇论文从不同角度对此展开了论述与阐释。其目的,一方面是整合中外文学研究中不断涌现的各种认知研究术语、理论、视角和方法,另一方面更是就当代认知诗学研究的繁复现状提出“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并通过术语创新和理论创新来创建世界认知诗学和认知文化研究的“中国话语”和“中国学派”。

文学研究的认知延展

——广义认知诗学原理与方法*

熊沐清

(四川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文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

摘要:随着认知科学的迅猛发展,与之相生相伴的文学认知研究也日益兴盛,枝叶繁茂,已经不是原有的“认知诗学”概念所能容纳和准确指称。事实上,认知诗学一词已经有不同涵义,所指有广义和狭义之别。因此,一种整合文学研究中所有认知研究理论、视角和方法的广义认知诗学呼之欲出。广义认知诗学的基本原理是运用认知科学相关理论、方法和技术进行文学研究,其目的是要发现新的蕴涵、形式、效果、机制、要素等,并予以尽可能科学合理的解释。它的主要研究方法是文本细读、科学实验和调查,“实证+质性”是它的方法论原则。

关键词:广义认知诗学;原理;方法

中图分类号: I0-0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2096-6431(2022)02-0132-07

DOI: 10.13715/j.cnki.jxupss.2022.02.017

引语 “认知转向”的繁荣与迷惘

20世纪40年代以后,心理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等领域的学者们逐渐意识到,他们所研究的都是同样的问题,即人类心智的本质,于是,他们相应地发展了互补的

和潜在的协同性探究方法(synergistic methods of investigation)^[1]。这一趋势随着科学技术尤其是计算机科学的迅猛发展而得到加强,由此萌生了一门“以研究智能系统的工作原理为对象的交叉学科”——认知科学。“认知研究”俨然

* 收稿日期:2021-10-20

作者简介:熊沐清(笔名熊沐清,1953—),男,侗族,江西丰城人,四川外国语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认知诗学研究理论与版图重构”首席专家,主要从事认知诗学、语言学、叙事理论、比较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0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认知诗学研究理论与版图重构”(20&ZD291)阶段性成果。

成了一种无所不包的“元科学”(meta-science),文学研究的“认知转向”就在这种背景中产生了。

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早在1962年的《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就曾预见到“把研究人脑进化的科学与文化阐释结合起来的尝试将会遇到困惑与抵制”^[7]。因此,这种认知与文化研究的结合直到20世纪90年代才开始逐渐为人们所理解与接受,90年代以后,文学的认知研究逐渐兴起。理查森(Alan Richardson)和斯迪恩(Francis F. Steen)的论文“文学与认知革命简介”(Literature and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从学理上论述了文学中认知转向的动因:文学研究和认知科学对语言、心理行为和语言艺术同样有兴趣,对类似的阅读现象、想象力的投入和文本模式,都发展出了不同的研究方法。刚开始的联系还只是分散的、零星的,是研究者各自的孤立的行为,而现在则变成了某种协调性的、系统的努力,出现了一个“可以宽泛地界定为‘认知文学研究’的领域”。^[8]这一宽泛的领域就是文学研究向认知科学的延展。

正是由于研究建立在众多不同领域的对话基础上,所以出现了许多与“认知”关联的研究范式或学科流派,如认知诗学、认知文学研究、认知文体学、认知叙事学、认知修辞学、达尔文主义文学研究、神经女性主义以及认知生态批评、认知后殖民理论、认知现实主义等等,不一而足,让人眼花缭乱,这是认知转向带来的繁荣,但这种繁荣犹如雨后林藪,草木疯长,使人们尤其初涉者不知这些林林总总的认知方法或理论之间有何联系又有何区别。而且,即使是“认知诗学”,也有流派或范式的差异,这就有厘清和统摄的必要。因此,我们根据各种认知理论与方法的本质特征和文学属性,对“认知诗学”和“认知文学研究”等多种流行的认知研究理论与方法进行辨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广义认知诗学”构想,意图廓清认知迷惘,促进文学认知研究的深入发展。

一、经典认知诗学与认知文学研究

“认知诗学”一词是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教授鲁文·楚尔(Reuven Tsur)于20世纪70年代所创,楚尔在他的博士论文(1971)中使用了认知的文学研究方法。1977年,他出版了《知觉指向的韵律理论》一书,从心理学角度系统论述诗歌韵律。1983年,他在特拉维夫大学正式出版了专著《什么是认知诗学》,“认知诗学”一词正式问世。到了90年代,楚尔又推出了两部认知诗学方面的专论,即《走向认知诗学理论》(1992)和《诗歌节奏:结构与表现——认知诗学的实证研究》(1998)。在《走向认知诗学理论》修订版(2008)的开篇,楚尔开宗明义地指出:

认知诗学是运用认知科学为工具来研究文学的跨学科方法(approach)。“认知科学”是一个宽泛的术语,涵盖了探索人类信息处理的多个学科,包括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人工智能、语言学的某些分支以及科学哲学的某些分支。它们探索知识习得、知识组织和知识运用中的心理过程;事实上,它囊括了人类大脑的所有信息处理活动,从分析直接的刺激到主观经验的组织。认知诗学探索认知学科对诗学的

贡献:它试图发现诗性语言和形式或者文学批评家的评判是如何受到人类信息处理的制约和塑造的。^[9]

但是,整个八九十年代,“认知诗学”并不是一个广为流行、普遍认可的术语,更不是一个有着明晰、广泛共识的学科或流派,它只是楚尔的个人“发明”和学术追求。因此,20世纪80年代开始兴起的文学的认知研究,就注定是一幅百花齐放、五颜六色的斑驳图景。直到21世纪伊始,英国诺丁汉大学的彼得·斯托克维尔(Peter Stockwell)和夫人盖文思(Joanna Gavins)等人出版了《认知诗学导论》(2002)及其姊妹篇《认知诗学实践》(2003),各种冠以“认知诗学”之名的著述才开始不断涌现。这两部姊妹篇著作几年后也直接推动了中国认知诗学研究。

由于发展迅猛,研究人员的学术背景和志趣各不相同,因而认知诗学的涵义也不尽相同。楚尔在《走向认知诗学理论》二版(2008)“前言”中就曾指出:自第一版出版以来,许多学者已经接受了“认知诗学”这一术语,使之得到广泛运用,但涵义颇有不同。斯托克维尔的“认知诗学”就与楚尔有明显区别。在为《布鲁姆兹伯利认知语言学指南》(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2014)所撰写的“认知诗学”一章中,有这么一段话可视为斯托克维尔的“认知诗学”定义:

对于认知诗学领域最为一致的观点是:它集中利用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研究文学文本和文学阅读;其核心是文体学的考量,即任何读者的或阐释性的文学解释都必须以明白无误的文本证据(textual evidence)为支撑。^[10]

很显然,斯托克维尔主要的理论工具是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方法论上以文体学传统为主,无怪乎许多人把认知诗学和认知文体学等同起来。

不过,并不是只有楚尔和后来的斯托克维尔等人在进行文学的认知研究,在楚尔之前即已有学者们开始从认知科学各种不同领域中吸取灵感或方法进行文学研究了。1971年,福斯(Foss)在《科学哲学》刊物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作为认知的艺术——超越科学实在论”的文章,认为艺术和科学一样极大地影响着我们的知觉和思维,帮助我们表现这个世界。这一观点的提出显然早于楚尔。1972年,塞西罗(Sircello)出版的《心智与艺术》(Mind and Art)是较早讨论心智的专著。该书主要从心智哲学角度讨论艺术的“表现”(expression)的心理模型,显然受到了正在兴起的认知科学的影响,也早于楚尔的认知诗学。21世纪之初更涌现了一批不断产生影响的研究者和大量著作,而这些成果绝大多数也没有冠以“认知诗学”之名,如埃琳娜·塞米诺(Elena Semino)和乔纳森·卡佩尔(Jonathan Culpeper)主编的《认知文体学:语篇分析中的语言和认知》(Cognitive Stylistic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Text Analysis, 2002),戴维·赫尔曼(David Herman)的专著《故事逻辑》(Story Logic, 2002)和编著《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Narrative Theory and the Cognitive Sciences, 2003)。其后,Palgrave出版社自2008年起开始编辑出版“文学与表演的认知研究”丛书;2014年,John Benjamins出版社推出“儿童文

学、文化与认知”丛书(Children's Literature, Culture and Cognition); 牛津大学出版社也于2016年开始推出一套丛书“认知与诗学”(Cognition and Poetics), 迄今仍在出版中。2015年, 丽莎·詹赛恩(Lisa Zunshine)出版编著《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2015) 全书30章, 集中展示了文学的认知研究最新成果, 汇集了多种认知研究范式, 如“认知历史主义”“认知叙事学”“认知酷儿理论”和“神经美学”“情绪与移情”“认知后殖民研究”“决策理论与小说”“认知功能障碍”“道德情感”“新的无意识”等。饶有意味的是: 这部大型文集没有收录典型的认知诗学研究成果。

最先实现体制化的是宽泛的“认知研究”而不是“认知诗学”。“由于认知科学日益成为理解人类自身的一种主导性研究范式, 因此, 运用它的知识来形成阐释人类文化产品的各种方式也就越来越具有影响, 于是, 1998年在美国现代语言协会的大会上把它确定为一个分组讨论的话题, 从此, 认知研究就成为文学理论的一个独特分支而实现了体制化。”^[1-9] 这里的描述用的是“认知研究”(cognitive studies) 而不是“认知诗学”。而绝大多数的认知研究也并没有聚集在“认知诗学”旗下。

认知文学研究则更显宽泛。丽莎·詹赛恩指出“认知文学研究的最佳定义是理查森(Richardson)于2004年提出的”^[1]。理查森把“认知文学研究”定义为“痴迷于认知科学的文学批评家和理论家们的研究, 他们之间有许多东西可以交流, 不管他们之间有着什么样的意见分歧”。理查森和斯迪恩(Steen)这样描述说:

一批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 通过与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后乔姆斯基语言学、心智哲学、神经科学和进化生物学等认知科学不同领域的对话, 从中汲取灵感、方法和研究范式, 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 鲁文·楚尔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在发展他的“认知诗学”; 著名心理分析批评家诺曼·赫兰德(Norman Holland)在1988年展示了从认知神经科学中发展出来的“更强大的心理学”的优势; 马克·特纳(Mark Turner 1991)推进了他那影响深远的“认知修辞”研究项目; 艾琳·斯波尔斯基(Ellen Spolsky 1993)把“认知不稳定性”引入文学阐释。^[1-8]

很显然, 理查森和斯迪恩把认知诗学归于认知文学研究范畴。《普林斯顿诗与诗学百科全书》(2012年第四版)也是这样处理的:

(认知诗学是)快速发展的认知文学批评领域中的一个分支, 阿伦·理查森(Alan Richardson)把它进一步细分为认知修辞学、认知叙事学、认知接受美学、认知唯物主义和进化论文学理论。它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发端于结构主义、俄国形式主义、生成语言学、新批评和格式塔理论。认知诗学是跨学科的文学研究进路, 利用认知心理学、心理语言学、人工智能和语言学及哲学其他一些分支的工具。这些学科探讨人类在知识的习得、组织和运用包括知觉与情感过程中的信息处理活动。^[272]

从以上梳理不难看出: 第一, 各家对“认知诗学”和“文学认知研究”的界说并不一致; 第二, 各家都重视对语言学相关理论和方法的运用以及对文本语言形式的分析, 但程度有所不同; 第三, 无论“认知诗学”还是“认知文学史”, 均有狭义和广义之分; 第四, “认知诗学”与“认知文学研究”在涵义和指涉上也有重合之处。第五, 大多数的认知研究并没有冠以“认知诗学”之名。根据楚尔和斯托克维尔的理论主张和操作实践, 我们把他们的认知诗学研究称之为“经典认知诗学”。经典认知诗学与认知文学研究的主要区别在于:

认知诗学以欧洲(英国为代表)为主, 其学理和方法与认知修辞学特别是认知文体学非常接近; 认知文学研究则以北美为主。学理和方法上, 认知诗学的理论来源主要是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 而认知文学研究的认知科学基础主要是神经科学和进化理论等; 认知诗学方法论上侧重文体学传统, 认知文学研究更注重实验。文体学传统使认知诗学更关注情境性的语言语境, 而认知文学研究则更关注历史性的社会—文化语境, 因此认知诗学的语言—形式取向比较明显, 而认知文学研究的主题—意义取向更为突出。当然, 两者间的相同点也是明显的, 他们的主要理论和方法论来源都是认知科学, 都注重从心智角度关注和研究文学尤其是文学阅读, 主要哲学基础都是现象学理论, 都重视读者接受理论, 这是它们被统称为“认知文学研究”或文学“认知研究”的根本原因, 表明两者之间的“血缘关系”。实际上, 两者各有侧重又互为补充。^[2-3]

国内此前的关注主要集中于认知文体学和(狭义)认知诗学以及认知叙事学、文学达尔文主义, 但并不了解“认知文学研究”。究其原因, 国外的文学认知研究虽然历史较长, 但分布零散, 既没有一个统一的名称, 也没有就其理论、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达成共识, 所以, 其面目长期模糊不清, 国内学者自然对此如同雾里看花。直到2015年, 丽莎·詹赛恩(Lisa Zunshine)主编的《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出版, 才为国内学者所关注, 此后, 认知文学研究逐渐成为热点。

二、广义认知诗学的依据和原理

我们提出“广义认知诗学”的观点, 主要依据有三: 一是国内的文学认知研究状况, 二是国外对“认知诗学”的广义界说, 三是它的学理上的“认知”属性。所以, 广义认知诗学的提出, 既是研究实践的需要——这是广义认知诗学的必要性, 也是认知诗学自身学理特质和内在结构的必然逻辑。概言之, 广义认知诗学立足于认知的原则, 而它的“广义”则源于认知科学的广义性和多学科性。

国内学界最先注意到认知诗学的是语言学界的学者尤其是认知语言学和文体学研究者, 国内最早的几篇书评和评述就是出自语言学者之手。直至今日, 国内认知诗学的研究队伍中, 学术背景为语言学(包括文体学)者仍为数不少。由于文学的认知研究种类繁多, 国外迄今没有一部总括性的研究或介绍性的著作, 难免让人眼花缭乱。而在国内, 由于研究者多由认知语言学和认知文体学入门, 而斯托克维尔的认知诗

学主要理论依托是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所以他的《认知诗学导论》一书对语言学者来说相对简明易懂,因而国内的认知研究多取这一路径,许多人误以为这就是文学认知研究的全部或精华,殊不知这仅仅是其中之一,不知认知诗学有广义狭义之分。另一个相对繁荣和成熟的认知研究路径是认知叙事学,它走的是文学路径,但和斯托克维尔那种源于语言学和文体学的认知诗学并未贯通,国内不少人把这两者视为两个不同领域和学科。因此,从推进文学的认知研究健康发展的角度出发,有必要厘清认知诗学的狭义与广义之分,明确广义认知诗学的基本脉络、涵义、原理及方法。

国外学者对“认知诗学”的看法也并不一致,但都没有拘于一隅。这里要指出的是:鲁文·楚尔的“诗学”也是狭义的,它主要指诗歌的研究。^[1] 313 斯托克维尔也认为“认知诗学”有广义与狭义的两种理解。他和哈里森(Harrison & Stockwell, 2014: 218)指出“认知诗学”这个术语是鲁文·楚尔于20世纪70年代发明的,当时是用来指称他自己对诗歌的知觉效果的研究。过去二十年来,这个术语的应用范围扩大了,不仅包括利用认知心理学和认知语言学研究文学文本和文学阅读,甚至出现了更宽泛的“认知文学研究”,其中包括了进化批评,具身和社会认知,也都成了文学批评理论的一部分。^[2] 218 很显然,他们认为“认知诗学”已经有广义与狭义之分了,而他们是把“认知文学研究”归于广义的认知诗学。

美国认知诗学主要人物M. 弗里曼(2014)总结了当前一些学科对认知诗学的贡献及相关研究,相关领域有:人类心智进化中的文学创造性,文学与神经科学,认知与诗学,情感研究,审美理论等。相关研究方法则有整合与交流,实证与实验研究,认知语言学进路等。^[3] 313-327 很显然,她心目中的“认知诗学”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因为她所指出的相关领域和理论命题已经超越了楚尔和斯托克维尔的认知诗学范畴。另一个近年来十分活跃的认知诗学研究者是挪威奥斯陆大学的博士生导师卡琳·库科宁(Karin Kukkonen)。她提出“文学认知方法的前历史”这一观念,认为不同时期的诗学是文学中人类心智活动的概念化结果,所以应该从认知的角度去研究文学史。在《认知诗学的前历史:新古典主义与小说》(2017)一书中,她认为新古典主义批评家是认知诗学理论构建的重要先驱,他们构建了情感、人物塑造和情节等不同心理现象和文学现象的交叉点;确定他们的合作方式;并为它们命名(如诗的正义)。因此,“认知方法只是在缓慢地重建,在我看来,重新考虑新古典诗学作为当前认知方法的先驱”^[4] 15 显然,这里的“认知诗学”是广义的。她还明确地道出了自己心目中的“认知诗学”:“我在这里使用‘认知诗学’一词的意义在于,它包含了文学文本的所有特征(叙事、文体和美学),因此,它借鉴了所有这些分别以认知方式理解文学的方法。”^[5] x

很大程度上,所谓“广义认知诗学”的外延相当于“认知文学研究”。那么,我们为什么不用“认知文学研究”去涵盖“所有这些分别以认知方式理解文学的方法”呢?这里既有约定俗成的习惯,也有学理上的考虑。从习惯上来说,如前所述,中国学

者最先接触到的比较稳定、成型的理论和研究范式是“认知诗学”,国内以“认知诗学”为主题召开了十余次全国性和国际性学术会议,成立了全国性学术团体“中国比较文学学会认知诗学分会”,创办了《认知诗学》集刊。笔者早在2015年即首次提出“认知诗学”和“认知文学研究”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并主张以广义的“认知诗学”一词泛指所有的认知文学研究。^[6] 159-164 国外学者也有“认知诗学”的广义用例,比如《普林斯顿诗与诗学百科全书》(2012年第四版)的“认知诗学”条目指出:阿伦·理查森把认知诗学进一步细分为认知修辞学、认知叙事学、认知接受美学、认知唯物主义和进化论文学理论等,此处的“认知诗学”显然是广义的。

从学理上来说,也有两点主要考虑:其一,正如斯托克维尔所说的“诗学”一词暗示理论的系统性,从词义演进的历史看又意寓操作的技术性,符合广义认知诗学既有文学理论探讨又有文本分析的研究特征。其二,“研究”一词涵义宽泛,接近于日常用语,似乎缺乏严谨的学术意味,而“诗学”则是古老且依然生机勃勃的学术话语。

综上所述,我们使用“广义认知诗学”指称所有基于认知科学的文学研究,其中包括:通常意义上的“认知诗学”(即楚尔和斯托克维尔的“认知诗学”),认知叙事学、认知文体学、认知文化研究、认知美学、认知接受美学、认知唯物主义以及众多已经成型或正在形成中的范式、方法和理论探索,如:认知历史主义、认知后殖民理论、神经女性主义、神经美学、情感叙事学、情感生态批评、情感地理学批评、认知空间批评、认知酷儿理论、认知现实主义、进化论美学和进化论文学理论等等,也包括认知修辞学涉及文学批评的那一部分。一般情况下,我们是在广义的基础上使用“认知诗学”这个术语——很多情况下中国学者已经这样做了,只是在需要区分的情况下我们才加上“广义”二字,使用“广义认知诗学”以区别于“经典认知诗学”即楚尔和斯托克维尔的“认知诗学”。

广义认知诗学可以简单描述为“一种建基于认知科学的诗学”,它的具体内涵是:创造性运用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方法和技术研究文学,是注重实践性和方法论创新的诗学体系。它的研究对象是文学艺术,包括文学艺术的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文学艺术的生产和接受、文学艺术思潮和流派、文学艺术的鉴赏与批评、文学艺术的历史演变、文学艺术的比较和对比,等等。

这个描述可以看作是广义认知诗学的定义。它采撷了各家的一些基本观点,但同时填补了各家的一些缺陷。一方面,相比经典认知诗学,广义认知诗学并不把自己仅仅看作是一种方法或进路(approach),而是包涵了方法在内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契合学者们对楚尔后期认知诗学思想的客观评价。在楚尔2017年的新著《作为认知化石的诗歌成规》(Poetic Conventions as Cognitive Fossils)中,四位语言学名家共同撰写了“序言”,他们在“序言”中指出:楚尔把认知诗学界定为一种理论性的方法论(theoretical methodology)^[7] vii。同时,它也排除了认知文学研究遗漏经典认知诗学的可能。比如,丽莎·詹赛恩(2015)主编的《牛津认知文

学研究指南》没有包含认知诗学,显然她的“认知文学研究”是一个相对狭义的指称,它与“认知诗学”似乎是一种平行关系。她在与笔者的通信中承认,认知文学研究与认知诗学确有不同,但除了地域上的原因外,她并未深谈导致两者不同的其他原因。

广义认知诗学涵盖如此之广,绝不是它自我膨胀,而是认知研究的现状和它的学理所致。认知科学是一个发展迅速、疆域广阔的学科群,何塞·路易斯·贝穆德斯(José Luis Bermúdez)概括说:认知科学从许多不同学科汲取了研究工具和技术,包括心理学,哲学,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神经科学,数理逻辑等等。它从根本上说是一种跨学科的活动。^[14]四十多年前的“斯路恩六角形”(又叫作“认知六边形”)就勾勒了认知科学的十一个不同子域:控制论;神经语言学;神经心理学;认知程序模拟;计算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心理哲学;语言哲学;人类语言学;认知人类学;大脑的进化。^[15]今天的认知科学更涉及生物科学、情感科学、管理科学、社会学、教育学等领域。如此广大的领域,它们给予文学研究的认知资源也必然繁复多样,这就不是楚尔和斯托克维尔的认知诗学所能容纳,只有广义认知诗学才能汇聚源自众多学科的认知研究方法和视角。

三、广义认知诗学的研究目的“解释”还是“发现”?

任何一个成熟的学科,都必然有自己明确的研究对象、研究目的和方法论体系,这些构成该学科的质的规定性,使之成为某一个特定的学科。尽管广义认知诗学目前还不是一个成熟、周密的学科,但至少也是一个研究领域,或者一个研究的“集群”,它也应该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目的和方法。目前,各种认知研究领域宽泛,边界模糊,形式多样,但我们仍然有必要勾勒出它的学科“概貌”,尝试探讨它的学科属性、研究目的和方法。这里,我们着重讨论两个基本问题:广义认知诗学研究的目的是“解释”还是“发现”?就其学科属性来说,它是一种文学理论抑或仅仅是一种新颖的研究方法?

关于广义认知诗学的研究目的,简单说就是运用认知科学的某些理论、概念和方法去研究文学——既研究文学文本,也研究文学阅读以及一切的文学活动和文学现象,力图获得新的、合理的、可以检测的科学结论。但是,它与一般的或者传统的文学研究有什么区别?与经典认知诗学和认知文学研究有什么不同?

广义认知诗学——无论是其中的经典认知诗学、认知文体学或是认知文学研究和认知文化研究,其研究对象都是文学,而不是纯粹的语言研究或者认知研究。但是,它又不同于传统的和一般的文学研究,而是借助认知科学的相关理论、方法甚至技术去研究文学理论、作家作品、文学批评方法以及文学史,探究文学和文学活动背后的心智活动,比如,一般的文学研究讨论“雄浑”风格,会探讨它的涵义、特征、缘起、语境、典型代表等等,认知诗学也会讨论关注这些因素,但它还会进一步探讨“雄浑”与人类认知普遍性和文化特定性之间的关系,探讨它与人的认知机制、认知风格、认知偏好等等之间的关系,这就与传统的和

一般的文学研究区分开来了。

广义认知诗学与经典认知诗学在研究目的上有一个突出的差异,即:重在“发现”。经典认知诗学的主要研究目的是“解释”,就是说,认知诗学的研究目的主要不是对文学文本或者文学现象(包括文学阅读)获得新的发现,而主要是对研究对象做出新的、更具科学性的合理解释。这一点,以彼得·斯托克维尔为代表。所谓“发现”,指认知诗学的研究能够“发现”别的方法所未能发现的东西,比如文本的涵义,文本的某些形式特征或某些文学现象等,它是某种“预测”能力。不过,斯托克维尔似乎并不主张认知诗学应该具有这种“预测”能力即“发现”的能力。

在《认知诗学导论》中,斯托克维尔明确提出“认知诗学的研究目的是对读者如何在当时如此理解文本做出合理的解释,从这点来看,认知诗学没有预测能力,而且,自身也不能产生解释。”^[16]他之所以持这种观点,我们认为,主要是受文体学传统的影响。文体学传统认为,文体学的分析主要是对文本的效果进行解释,而不是去发现新的效果或意义。塞米洛(Elena Semino)和卡尔佩珀(Jonathan Culpeper)在他们主编的《认知文体学:语篇分析中的语言和认知》一书“前言”中写道“认知文体学承袭了文体学的传统,即主要关注语言选择与效果之间的关系,认知文体学则是要关注特定语言选择和结构的认知效果。收入本书的十二篇文章中,大多数文章的一个共同目标就是解释对于对象的阐释是如何获得的,而不是提出对文本的新的阐释。”^[17]

我们认为:任何新的文学理论和研究方法都应该并且有可能因其独特的观照角度而对文本有新的发现。一种新的文学批评方法,或者一种新的阅读理论,不仅应该能够解释阅读过程或阅读机制,解释特定文学效果,还应该解释出用别的分析方法不能解释出的文本涵义或美学涵义。独特的方法产生出独特的功效,这才是认知诗学的价值,也是它存在的根据和理由。否则,它既不是一种文学理论,甚至也不是一种具有独立品格的分析方法,而只不过是认知文体学的另一种说法而已。认知诗学的根本任务或存在根据是“从解释到发现”,就是要力求发现作品效果的新的原因、作品新的涵义或新的美感。所谓“发现新的原因”,即对人们业已感知的文学效果做出新的解释,或对读者的阅读做出新的解释。“发现新的涵义”则是要对文本读出新意,发现别的阅读方法未能读出的涵义或未曾关注的某一侧面;而“发现新的美感”则是对文学效果的进一步发掘,发现文本新的形式特征和美学价值,得到新的审美体验。认知诗学有超出文体以及文体效果的研究对象,这是它作为一个独立学科与认知文体学的区别性特征;它也要在认知科学框架内对文学包括文学阅读、文学批评做出自己的解释和贡献,这是它作为一种新的文学理论的质的规定性。

就学科属性来说,认知诗学无论就其狭义还是广义而言,它都属于文学研究领域。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现在的问题是:认知诗学——或者说广义认知诗学,到底是一种“诗学”即文学理论,还是一种批评方法或方法的汇集?

认知诗学之所以选定“诗学”(poetics)来命名,自有其历史渊源。在西方,自从亚里士多德以来,“诗学”便指称关于文学的理论。斯托克维尔、盖文思和斯迪恩等人以“诗学”来命名自己的研究领域,映射出他们建构文学理论体系的雄心。事实上,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此也有所披露。斯托克维尔在《认知诗学导论》的“前言”中专门介绍了“诗学”的含义,指出“在现代文学理论中,诗学逐渐含有‘理论’或‘系统’之意。但我也看重它与其相关且又暗含的‘诗’这个词的联系,暗示了在这个领域中思维的实用性与创新性”。^[14] 他同时指出:从根本上说,“认知诗学是对文学的一种思考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框架。”^[14] 盖文思和斯迪恩则在《认知诗学实践》一书中引用了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中的一段话,认为卡勒这段话里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点便是批评与诗学之间的差别。按照卡勒的观点,“诗学”指的是“完整、系统的文学理论,它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必须应用于对具体文本进行解读的那种实际的文学批评。”^[14] 虽然“认知诗学是直接基于认知语言学和认知心理学建立起来的,后两者都是认知科学的组成部分”。^[14] 但认知诗学与认知语言学的关系却是一种“结盟”(align)而非统属的关系。其结论是“它(认知诗学)也不仅仅是认知科学的一个分支,而首要地是一种新的诗学。”^[14]

从目前国内外的认知研究实际来看,广义认知诗学——包括经典认知诗学、认知文体学、认知叙事学、认知文学研究、认知文化研究、情感研究等等——早已从整体上超越单纯的方法论范畴,它事实上已经汇集成了文学研究的一种开放性领域,在这个新的领域中有些集中于文本阅读和分析,比如经典认知诗学;有些专注于语言及其效果,比如认知文体学;有些聚焦于叙事的种种认知机制(生物的、文化的、情感的或历史的),比如认知叙事学;有些如认知文学研究则繁复多样,并无一定之规。因此,广义认知研究的目的是立足文学本体,依托认知科学相关理论和成果,构建开放性文学理论体系。它的理论体系涵盖文学研究的全领域,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甚至可延伸于比较文学。它将在梳理认知研究各流派各范式成果的基础上进行反思性批评,融通、整合各家理论与方法,优化完善,建立一个创新、合理、系统、有效的认知诗学理论和方法论体系。

四、广义认知诗学的研究方法

目前的认知诗学——即包括狭义认知诗学和狭义认知文学研究,它的研究方法可以简单概括为“认知的”研究方法,即,借用来自认知科学某一领域的理论、概念、方法及技术对文学的各种现象进行研究。由于认知研究流派纷呈,范式众多,所以表面看来,它们采用的研究方法五花八门,令人眼花缭乱。但细加梳理,却可以概括为奥蒂斯(Laura Otis)归纳的三种主要模式:其一是在实验室进行的神经科学研究(neuroscientific studies),比如眼动实验/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 functional 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等;其二是文本细读(close readings of texts);其三是访谈(interview-based research),包括调查和问卷等。三种模式各有长短:神经科

学的研究可以提供有用的资料或数据,但实验室很难复制成熟的纷繁的生活经验;文本细读可以提出精彩的见解,但通常只是基于某一个体的心智视角;基于访谈的研究则可以从多种多样的心智世界中呈现各种内省。作者认为,在本文所描述的质性研究中,访谈可以揭示这一现象,即:在词语激发人们的想象时,会有什么惊人的变异或不同。访谈是一种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文本、文化和不同的大脑造就了广泛的阅读经验,质性研究可以为实验研究和文本研究提供补充。^[14] 506 质性研究能够以行为研究和神经影像实验所不能采用的方式去表达文本所激发的神经影像(mental imagery);基于访谈的研究可以对实验室得出的数据提供补充,加强跨学科的作用,把文学学科与认知神经科学结合起来。^[14] 519

我们认为,奥蒂斯归纳的三种主要模式可以作为广义认知诗学研究的三大方法,即:文本细读、科学实验和调查。这些方法有一个共同点:注重实证性。但是,这并不是排斥思辨,而是质与量的结合。根据各方的讨论和我们的研究实践,我们认为,广义认知诗学研究在方法论上应遵循一个原则:实证研究与质性研究的结合。在这里,各种相关实验、调查、访谈和文本的语言分析(包括语料库分析)都是实证性研究。在广义认知诗学的实践中,研究者通常由实证研究入手,获得证据或数据后,再做进一步的认知分析。这里的“认知分析”指的是基于认知科学相关理论和成果的分析。广义认知诗学把文学的研究分为三种基本类型:主题研究,形式研究和读者研究。这三种类型都应该依循“实证+质性”的方法论原则。比如,广义认知诗学的文本细读不能简单等同于新批评以来的细读。认知诗学的文本细读是从语言学分析入手——这是实证性的,然后对观察到的材料进行认知分析——这是思辨性的,但这种思辨是建立在认知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而不是主观臆测。差异就在这“认知分析”上。由于认知科学是一个庞大且仍在生长的学科群,所以支撑认知诗学研究方法的理论和范式来源也极其繁富。认知文学研究领域知名专家、美国学者霍根(Patrick Colm Hogan)曾指出:文学的认知研究有多种方法或范式,最初有心理分析的,语言学的,社会学的,计算机科学的,很快又有人类学、社会心理学、神经生物学、遗传学、进化生物学以及来自物理学的动力理论等学科加入。因此,广义认知诗学的认知分析可能是一种认知文化批评,一种认知社会学分析,认知人类学分析,认知历史主义分析,认知空间批评,认知生态批评,认知/神经女性主义批评,认知情感批评,认知现实主义批评,等等,不一而足。

笔者曾经指出:不同方法有不同的研究目的和研究对象。“文本细读”顾名思义是针对文本的,目的是对文本提出某种阐释(interpretation);“科学实验”和“实证/行为研究”主要是针对“阅读”——更准确地说是针对“读者”的,旨在为某种文学活动或文学现象的解释或阐释提供证据。^[14] 288-289。实验和实证这两种方法从目前来看,主要不是探讨文本的意蕴,而是读者怎样接受文本、怎样受文本影响、

对文本产生何种反应? 这种研究迥异于千百年来人们对文学的理解和接受,所以,目前许多人(专业的文学批评者和普通的文学读者)对此持怀疑乃至批评态度。但实验实证研究主要是针对文学基本理论和读者反应,不是针对文本解读的。换言之,它不是狭义的文学批评的方法,而是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国内外许多人对此不了解,缘木求鱼,不免失望;或方枘圆凿,导致怀疑和否定。

五、结语

国际认知科学学会执委会前主席、加拿大学者保罗·萨伽德(Paul Thagard)在《心智:认知科学导论》一书的结尾处写道“认知科学是一项引人入胜、激动人心的事业,涉及多种多样的、跨学科的研究进路,其核心是对心智的计算—表征理解,而这一核心还需要进一步扩展和补充。在认知科学中有许许多多令人激动的项目等待着未来的探索者。”^[24] 这段话,对认知诗学同样适用。社会生活和认知科学的发展为文学研究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广义认知诗学应该以开放的宏大襟怀吸收并利用这些新颖甚至是陌生的力量,通过向认知科学领域的延展,推动文学研究在视域和方法上的创新,从而取得更深刻更可信的研究成果。

参考文献:

- [1] Stillings, N. A. *Cognitive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MIT Press 1999.
- [2] Zunshine, Lisa (ed.).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Cultural Studies* [C].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10.
- [3] Richardson, A. & F. F. Steen. *Literature and the Cognitive Revolution: An Introduction* [J]. *Poetics Today*, 2002, 23 (1).
- [4] Tsur, R. *Toward a The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Second, Expanded and Updated Edition* [M]. Brighton and Portland: Sussex Academic Press, 2008.
- [5] Harrison, C. & P. Stockwell. *Cognitive Poetics*. Jeannette Littlemore & John R. Taylor (eds.). *The Bloomsbury Companion to Cognitive Lin-*

guistics [C]. London & New York: Bloomsbury Publishing Plc., 2014.

[6] 熊沐清. 文学批评的认知转向——认知文学研究系列之一 [J]. *外国语文*, 2015(6).

[7] Zunshine, Lisa (ed.).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C].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8] Greene, R. *The Princeton Encyclopedia of Poetry and Poetics* [M]. Princeton &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9] 熊沐清. 文学批评的认知转向——认知文学研究系列之二 [J]. *外国语文*, 2016(1).

[10] Freeman, M. H. *Cognitive poetics*. Michael Burke (ed.). *The Routledge Handbook of Stylistics*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11] Kukkonen, Karin. *A Prehistory of Cognitive Poetics: Neoclassicism and the novel*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2] 熊沐清. 文学认知研究的新拓展《牛津认知文学研究指南》评述 [J]. *当代外国文学*, 2015(4).

[13] Tsur, Reuven. *Poetic Conventions as Cognitive Fossils* [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7.

[14] José Luis Bermúdez. *Cognitive Science: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cience of the Mind*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2.

[15] [美] R. M. 哈尼什. 心智、大脑与计算机: 认知科学创立史导论 [M].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16] Peter Stockwell. *Cognitive Poetics: An Introduction* [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2.

[17] Semino, E. & J. Culpeper. (eds.). *Cognitive Stylistics: Language and Cognition in Text Analysis* [J].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2.

[18] Gavins, J. & G. Steen (eds.). *Cognitive Poetics in Practice* [C].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19] 熊沐清. 外国文学研究“认知转向”评述 [J]. *英美文学研究论丛*, 2019(2).

[20] [加拿大] 保罗·萨伽德. 心智: 认知科学导论 [M]. 朱菁, 陈梦雅, 译.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2012.

责任编辑: 万莲姣

The Cognitive Extension of Literary Studies: Principles and Methodologies of Generalized Cognitive Poetics

XIONG Mu - qing

(Center for Linguistics, Literary & Cultural Studies, Sichu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31)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cognitive science,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has become increasingly prosperous, sprouting out a lot of branches, thus the original term cognitive poetics is no longer suitable for use to describe or define this vast field of cognitive researches. Actually, cognitive poetics has been endowed with different connotations, which can be categorized into cognitive poetics in a narrow sense and that in a broad sense. Therefore, a generalized cognitive poetics, which integrates all the theories, perspectives, and methodologies employed in cognitive literary studies, seems ready to come out. The fundamental principle of generalized cognitive poetics is to study literature by drawing on relevant theories, methods and techniques from cognitive science, aiming to discover new implications, formal features, effects, mechanisms, and factors in literature and make scientific and reasonable explanations. The three main approaches to Generalized Cognitive Poetics include close reading, scientific experiments, and investigation, with “empirical - qualitative research” as its methodological principle.

Keywords: Generalized Cognitive Poetics; principle; methodology